

国家竞争力理论综述

牟文富

摘要 历史上的国家竞争学说始于马克斯·韦伯,他将新教伦理精神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业绩联系起来,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化决定论。制度创新理论可以解释国家经济为何具有活力。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以企业的竞争力为核心,认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界中的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的发挥有赖于高效率 and 不断创新的制度环境、良性的文化价值环境,以及如何利用全球一体化这样的大背景。

关键词 文化价值观 制度创新 竞争优势 文化价值环境 制度环境

一、问题:国家的命运与目前的境况

“近代国家的实质乃是把普遍性同它的成员的完全自由及私人幸福连接在一起的”。^①本世纪广大殖民地各民族在争取独立的时候,国家被广泛地视为一种神圣的目标,国家成为民族自由的具体体现。东方的现代国家观念是西方入侵导致民族觉醒的产物,并随着世界政治冲突变得日趋激烈而逐渐强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领域中的变革,使知识成为可视化的和可操作的,或是可以出售的,或可以通过数据库储存的,通过数字信号传播的,在这种知识环境中没有国家的神圣性。国家只担负着使其经济保持旺盛的活力的重大任务,这样,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陷入了提升经济力量的长途努力之中,因此国家怎样才能富有竞争力就成了国家的最大任务了。

在历史上,关注国家竞争力的学者和政治家很多,早期的理论家并不是专门研究这一问题,而是在构造其学说的过程中谈到了这一点,或者没有谈到,但其理论的结论却成了解释国家竞争力的理论框架。由于国家竞争力理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领域,也是一个新的领域,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有关理论进行梳理,以供读者参考。

1. 马克斯·韦伯理论 要将韦伯的理论与有关国家的竞争力联系起来可能有点牵强,但在考虑为何一些国家在历史上能脱颖而出,比其他国家更有生命力,尤其这些考虑是从文化或价值角度入手的时候,韦伯的理论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特有的理性主义的作用。韦伯在研究经济历史的时候,给资本主义的存在总结了6个先决条件。(1)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2)自由的市场;(3)作为资本会计制度基础的计算技术;(4)可预测的规律,包括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这是合理运用工业组织的必要依靠;(5)自由的劳动;(6)经济生活的商业化,也就是使用商业手段来表明企业和财

产所有权。

上述因素可以说也是经济理性主义。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具备这些条件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不呢?韦伯认为“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②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些种子和因素“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缺乏独特的精神气质。他从富兰克林有关时间、效率、信用和金钱所具有的繁衍性的格言中找到了新教伦理中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主义的种子。新教伦理所拥有的独特的工作伦理使新教徒容易接受经济理性主义精神。新教伦理的某些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韦伯的分析方法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的分析方法,他的命题被学者广泛用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总是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甚至贫穷,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发展迅速,充满希望。当然,学者也并没有仅仅采纳韦伯的成果而自己没有创新。韦伯的意义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文化的分析方法和视野,建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传统。

2. 文化决定论理论 早期的学者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诸多千差万别的落后国家进行对比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接受了韦伯的观点,即典型的西方文化理性主义优势。特别是在一些研究现代化的学者眼中,西方和东方事实上就是现代性与传统二分法的表现形式。^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堪称为世界的奇迹,在短短30年的时间中,日本将西欧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甩得很远。于是研究日本竞争力的学者在日本文化中去寻找原因。在日本引起世界瞩目的时间中,台湾、香港、韩国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也快步赶上,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被称为是经济发展的值得学习的典范。所以总结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就很自然了。在这些经验中,下列因素被认为与文化有关: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及和谐,等等。^④

在研究资本主义诸国家中文化价值对国家竞争的影响时,有学者将韦伯视为是西方特有的优势因子作为物极必反的因素。在创造财富的价值中,美国具有优势的是它价值观念中的普遍主义和分析主义。在影响经济绩效的价值观念中,美国的个人主义也是非常显著的因素之一。个人主义赋予美国最为强劲的创新精神,这一点没有人能够怀疑。批评者认为,个人主义的理想倾向于否认集体的价值,会侵蚀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会导致侵犯公共利益的搭便车行为,会导致恶性竞争和国内的内讧,而现代的竞争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国家之间的竞争。^⑤

上面的观点是1993年英国和荷兰的两位专家在其撰写的《资本主义的七种文化》一书中提出的。1993年前后是东亚将超过西方并进入太平洋世纪这种说法广为流传的时期,这本书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写出来的,多少有些思维定势的倾向。作者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企业价值观持批评态度,而对日本的文化极为欣赏,并对日本的发展战略、政府角色、教育、经济学、社会政策、劳工关系、发展哲学与资金来源等领域和英美两国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认可日本。总之,作者对日本,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包括德国,那种重视集体的价值,重视综合,重视人际关系,精心制定产业政策(这是取决于政治文化对政府职能怎样界定)等资本主义文化取向很是欣赏。

90年代中期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出版《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

书,该书以文化的差异性为出发点,以社会生活中的信任作为主轴来分析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业绩。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最高的经济效率不一定能由理性的利己行为来达成,反而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共同努力才容易达成,原因是这些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观,使他们合作起来更见效率。”^⑥ 这里,合作的效率取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信任被福山用来解释企业的发生、扩张以及形成庞大跨国企业集团的过程。如果信任只能给予家族内的人以及亲朋好友,那么现代意义上企业难以增生,也难以扩大。中国,还有同中国很相似的韩国,企业的产生和扩展都是政府和国家的行为促成。日本和德国社会中信任度很高,美国社会则具有双面特征,“一方面是崇尚独立个体的个人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是强势的联属倾向,人们都乐于参与团体活动”,“美国从一开始工业化,就是一个信任度相当高的社会”。总的看来,日本、德国和美国这三个信任度很高的国家在世界上是鹤立鸡群。

当 1997 年东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解释中文化因素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结论与以前也截然不同。东亚的国家本位主义、集体至上的价值观念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而且在早期被认为是东亚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精髓,但在东亚经济危机之后却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在东亚,国家对经济的发展负有绝对重大责任的理念是天经地义的,目前东亚国家的经济现状(成就和困境)应该说是和国家介入有密切的关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同时政府又具有一种“寻租”的天然倾向,手中的权力就成了腐败的最大诱因。大的例子有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家族所收敛的巨大财富被曝光,中等的例子有韩国、日本大财团因贪污腐败而倒闭,小的例子有遍及东亚的因人际关系和政府计划而发生的游离于法律、市场规则之外的经济行为,如指令性贷款,不切实际的巨型社会工程,其结果是银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根据自由市场的经济法则来看,市场经济的准则,就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和自由竞争。倘若东亚的经济行为不能够导致效用的最大化,不能有别的解释,只能是文化价值观念使之然尔。在东亚地区令人瞩目的时候,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认为是和经济发展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相容的,而在经济危机之后,上述因素又被解释为不但不相容,而且简直就是经济健康发展的痼疾。以文化的方法分析东西方价值观念对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作用,这种方法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3. 制度创新理论对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创新这个概念是早期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们提出来的。在这方面熊彼特是一个先驱,创新被认为是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熊彼特创新概念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生产要素的组织和利用,创造新的需求,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等等。这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其意义在于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企业家创新的能力。

制度创新是新制度学派的核心主张。制度学派对经济史的研究表明,综观历史,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则依赖于制度对此作出安排和制度对财产权作出界定。

“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这对理解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重要。在政治制度方面,宪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界定着产权,而产权的明确性与否又决定着利益的分配和经济行为者的期望值。“宪法决定了基本的产权,国家既提供仲裁与执行规则的框架,又颁布行为准则,以此降低政治结构中的服从费用和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这是制度学派国家模型的

重要特征。

制度变化的供给依赖两个方面:知识存量和创新的成本(与收益有关)。“我们所拥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化就会干得越好”。另一方面,制度创新的成本如果巨大,也妨碍了制度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出现失败而导致国家的死亡,或这制度不会出现变化而导致社会的停滞。

制度创新也被用来解释国家的权力和能力的内涵,这当然与国家的竞争力有关。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对产权的界定的能力,这决定了一个国家利益的分配、激励机制是否存在,负的外在性的广泛程度,等等。如果这方面失败了,那么国家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不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这种国家必将陷入衰退的困境。最现实的表现是俄罗斯的状况。它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没有足够的权力界定产权、制定基本的竞争和合作规则,因而在私有化过程中,非法攫取财产现象不可胜数。

4. 迈克尔·波特理论:国家竞争优势 在专门研究国家竞争力的学者中,波特从企业的竞争入手进而研究国家竞争力中的结构以及富有竞争力的产业政策,很具体,并且同现实紧密相关,可理解性很强,或许还有强的可操作性。

微观层次:企业的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理论中,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在这个层次上有两个核心的因素,一是产业结构中的竞争作用力,二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产业结构有5种竞争作用力,新的竞争对手的入侵,替代品的威胁,客户的侃价能力,以及现存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这5种竞争作用力综合起来决定某产业中的企业获取超出资本成本的平均投资收益率的能力。这5种作用力的综合作用力随产业的不同而不同,随产业的发展而变化。结果表现为所有产业从其内在盈利能力来看并不一致”。“5种作用力中的任何一种都由产业结构或产业基本的经济和技术特征所决定”。^⑦ 这决定了“竞争战略将是着眼于选择正确的产业和比对手更深刻认识5种竞争力的问题”。

一个企业在有很多的竞争对手时,仍然可以拥有两种基本的竞争优势:低成本或奇异性。企业为了获取这两种竞争优势可以制定3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标歧立异和目标集聚。成本领先者的低成本地位将转化为高收益。但成本领先者不能无视奇异战略。在奇异战略的指导下,企业力求就客户广泛重视的一些方面在产业内独树一帜。它选择被产业内许多客户视为重要的一种或多种特质,并为其选择一种独特的地位以满足客户的要求,它因独特的地位而获得溢价的报酬。“一个能够创造和保持经营奇异性的企业,如果其产品价格溢价超过了它为产品的独特性而附加的额外成本,它就成为其产业中盈利高于平均水平的佼佼者”。“由于标歧立异的厂商的价格溢价将会被其显著不利的成本位置所抵消,所以就绝不能忽视对成本地位的追求”。集聚战略的企业选择产业内一种或一组细分市场,并量体裁衣使其战略为它们服务而不是为其他市场服务。通过为目标市场进行战略优化,集聚战略的企业致力于寻求其目标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尽管它并不拥有在全面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在其细分市场上获得持久的成本领先或标歧立异地位,并且这一细分市场的产业结构很有吸引力,那么实施集聚战略的企业将会成为其产业中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佼佼者”。

在论述国家竞争力理论时,波特认为,一种新的理论必须超越比较优势而关注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这是其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必须解释竞争是动态的和进化性的这样一个前提,必须将方法与技术中的提高和创新作为一个中心因素;还必须解释国家在创新过程中的角

色,一个国家怎样为其企业提供一个环境,使其能在一种特定产业中的提高和创新快于其竞争对手。波特发现,如果企业不将其战略建立在提高和创新上,不愿意面临竞争,对其国家环境以及怎样改善它没有一种现实的理解,则企业最终不大可能成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和维持竞争优势是通过提高、创新和持续的升级来取得的。这与熊彼特的企业创新主张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

根据上述的理论构建方法,波特提出了一种描述国家竞争力的理论模型。这种模型是一种结构性描述,由决定因素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网络结构构成,被称之为钻石结构。4种决定性因素:要素环境,相关和辅助性行业,需求环境,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这4种因素都相互影响,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免于另外3种因素的影响。每一种因素都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只有当某一产业和行业中的钻石结构处于最佳状态时,该产业中的企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此外,有两个额外的变量——机遇(如技术革新造成的产业结构性变化)和政府——对上述4种因素也产生全面的影响,这样就构成了有关国家竞争力理论的完整体系。

要素环境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等。如果要素环境先天不足,则要设法创造。国内需求环境对提高产业水平有重要的作用,例如成熟和苛刻的需求环境能促进产业水准,具有前瞻性的需求能推动产业界的创新。需求的规模能决定产业发展的空间。相关和辅助行业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的投资的好处将逐步外溢到本行业里来,从而有助于该行业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例如,瑞典在特种钢行业中优势导致了在制造组装金属产品领域的优势,美国在半导体和软件领域的领先优势导致了美国个人电脑和其他几种技术先进的电子产品在国际上的巨大优势。

政府的角色在于影响4种决定因素。并非所有国家的竞争力结构都处于一种最优状态,所以这就给政府规定了任务。但问题在于要限定政府功能的外部界限,即要在“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之间折衷,政府政策的宗旨在于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竞争环境。

上述模型是一种静态的描述,波特认为竞争应该是动态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国家的竞争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创新推动阶段和财富推动阶段。前3个阶段是前进的阶段,而最后阶段则是衰落的阶段。根据经验总结,日本现在已经进入财富推动阶段,而美国则处在创新推动阶段。最后,波特总结为,竞争优势在根本上产生于提高和创新,牵涉到整个价值体系,只有通过不断的提高才能维持;持续的优势要求提升其资源,要维持优胜则要求采取全球性的战略。

需要注意的是,波特理论关注的中心不是全球水平上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在产业领域内的竞争。他的国家竞争优势实质上是一个国家里以企业竞争优势为核心的产业界的活力。

二、结论:一种更全面理论的可能性

文化分析方法虽然极富有挑战性,而且往往使研究者对人的精神状况做深入的研究,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它有静止看问题的缺点。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相对要稳定得多,这样就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经济业绩方面的变化;其另一个缺点是分析的层次太宏观,缺乏从微观的个体到群体这样的过渡研究,很难将文化同企业竞争和国家竞争力明确地对应起来,因而当研

究对象状况发生了变化,则得出的结论就跟着变,缺乏稳定性。但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某些文化因素(并不是全部由此决定),如契约精神,法治传统,等等,就必须依赖于文化的解释。

制度学派中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模型等,对解释技术创新的原因有非凡的说服力,尤其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可预测的宏观环境。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是长期性的,各国制度的本质并不一样,怎样比较国家的竞争优势呢?如果以目的论作为标准,则没有非凡业绩的国家的制度变迁历史就应该被否定。非正规制约的种类繁多,同该民族的文化遗传有关,那么文化是怎样影响制度的变迁和形成的呢?高效率制度的产生同文化背景有什么关系?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基本上是美国经验的总结。他的理论集中关注企业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企业在国内及国际产业界的竞争优势,立足于自由市场理论、典型的“经济人”假设这种理想模型,抽掉了企业行动的外部环境,如产权、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社会价值观念等。其理论中的创新概念对于企业维持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发展的阶段有重要意义,这又与制度学派的创新前提有了关联。

由此看来,单一角度的竞争力理论不是很完备。一个全面的竞争力理论最好能包括各种最主要的变量。下面尝试提出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模型。

理论构成:企业竞争优势作为国家竞争力理论的内核;企业运作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全球一体化进程这样的国际环境。

首先,企业必须具有竞争优势,这样国家才能有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竞争战略的重要性就尤为明显。波特所阐释的三种企业竞争战略可以原封不动地采纳。

在国家竞争力方面,鉴于波特的钻石结构模型似乎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政府和机遇两个外生因素被引入,而机遇是游踪不定,那么政府对国家竞争结构的影响就成为关键的变量。这可以归结到企业竞争的制度性环境中。

其次,企业竞争的制度性环境包括下列内容:政府的功能和角色;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稳定性;法律制度的性质。这些因素决定了企业以及个人经济行为是否存在一个可预测的环境。

政府在许多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方面发挥作用,有如下表现:维持公共服务(主要是维护法律和秩序),影响态度(对工作、节约、家庭规模、外国企业、收入不平等、特权阶级、社会流动、赢利、牲畜的神圣性以及新技术的态度等),形成经济制度(对所有权属、企业规模的态度,制定把公正和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法律框架,组织成立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影响资源的使用(保护环境和资源),影响收入的分配,控制货币,控制波动,确保充分就业,影响投资水平。

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稳定与否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若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则难以交易,或成本过高而使交易不可能。物极必反的是,制度长期没有创新而处于僵化状态,同样也给交易带来高昂的成本。

市场经济在实质上被认为是一种法治经济,因为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依赖于法律所确立的交易规则。法律是否完备影响了一个国家经济行为所赖以进行的可靠而有效的规则的数量。

其三,文化价值环境。要在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与它所寄生的国家母体的经济竞争力之

间找出精确的对应关系非常困难。研究者发现文化价值观念同经济业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建立。当然抛开因果链条和文化决定论,只谈大致的影响可能就容易了。例如,某种类型的文化观念强调物质的价值、工作、节约与生产性投资、商业关系上的忠诚、进行实验与承担风险、以及机会均等,等等,那么这种文化就有助于经济的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并非一种文化中所有的因素都有利于经济增长,或所有有利的因素都集中在一种文化中。

最后,全球一体化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前景的影响。在短时间里,二者的关系仅仅表现为该国家竞争力的强弱或有利还是不利。从长期来看,全球一体化环境对企业(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在于后者如何受到前者的影响。

造成未来国家竞争力强弱分野的因素有:(1) 国家目标的选择;(2) 国家的封锁和开放;(3) 是否愿意学习,这和第二项紧密相关;(4) 国家学习的成功或失败;(5) 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6) 制度的变化;(7) 企业在全球性的产业界中的竞争状况。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企业竞争不仅仅在国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国家竞争优势则取决于企业在产业界中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注释:

- ①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3页。
- ②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5页。
- ③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6页。
- ④ 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 ⑤ 汉普登·特纳,特龙佩纳斯,《国家的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徐联恩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7,60~61,68~71页。
- ⑥ 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 ⑦ M·波特,《竞争优势》,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4~5页。